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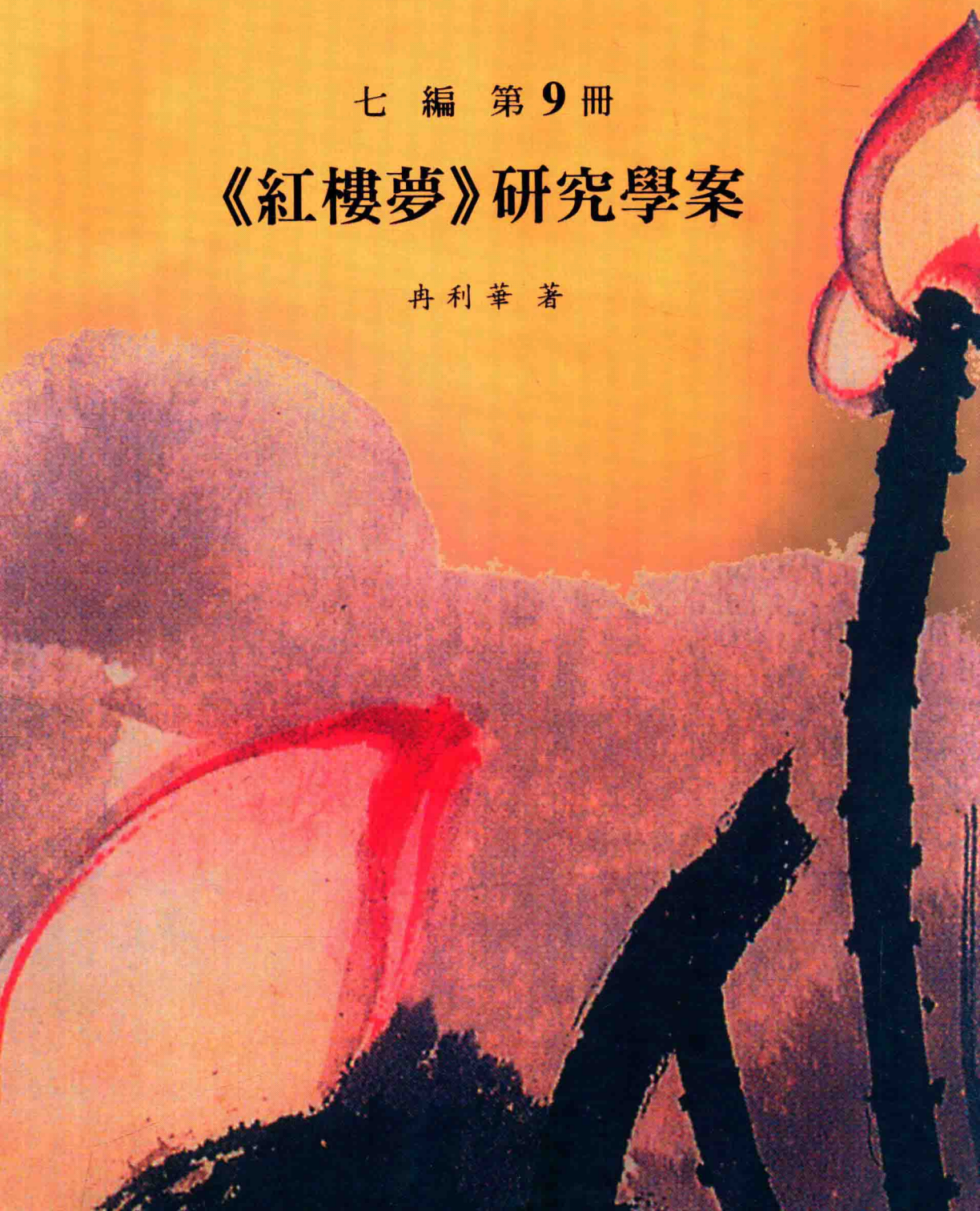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七 編 第 9 冊

《紅樓夢》研究學案

冉利華 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七 編

曾 永 義 主 編

第 9 冊

《紅樓夢》研究學案

冉 利 華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紅樓夢》研究學案／冉利華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序 4+ 目 2+21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七編：第 9 冊）

ISBN：978-986-322-098-5（精裝）

1. 紅學 2. 研究考訂

820.8

102001630

ISBN-978-986-322-098-5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七 編 第 九 冊

ISBN：978-986-322-098-5

《紅樓夢》研究學案

作 者 冉利華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七編 16 冊（精裝）新台幣 2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紅樓夢》研究學案

冉利華 著

作者簡介

冉利華，女，湖北監利人。文學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教師。主要從事文學理論、跨文化交際等方面的研究。在《文藝研究》、《中國文學研究》、《學海》、《文藝報》等刊物發表論文、譯作二十餘篇，並有譯著出版。曾于韓國以及美國等國高校任教、訪學。

提 要

《紅樓夢》是中國文學中當之無愧的經典。與所有經典一樣，其崇高地位也經歷了一個建構的過程。本書主要對幫助確立與保持其經典地位的非文學性因素進行探討。

名人效應在《紅樓夢》經典化過程中表現得非常明顯。本書通過對蔡元培、胡適、毛澤東與劉心武等中國現當代名人的「涉紅」情況進行定點考察，發現：從表面上看，是包括這幾位關鍵人物在內的諸多名人的「贊助」開啟並推動了《紅樓夢》經典化的過程，而實質上，這一經典化過程中一個個關鍵點背後的動因，卻原來是一場場沒有硝烟的文化資本戰爭。文化資本爭奪戰是紅樓夢經典化的第一大外因。

《紅樓夢》的研究在中國已成一門顯學——紅學，而其中「考證紅學」尤其發達。對此，面向大眾的、綜合性的報紙功不可沒。權威媒體推動下的紅學繁榮可謂《紅樓夢》經典化的第二大外因。

《紅樓夢》經典化的第三大外因則是《紅樓夢》在中國社會的高度普及。《紅樓夢》不僅文本高度易得，而且還以其他林林總總的方式滲透進了中國人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這種高度普及性既是作為文學作品的《紅樓夢》被經典化的結果，同時又進一步在全社會加深並鞏固了《紅樓夢》作為經典的形象，反過來成為了《紅樓夢》經典化的另一大外因。

序 言

冉利華的博士論文即將出版，囑我作序。她把修改後書稿寄來了，我很有興味地重讀了一遍。寫下了下面這些文字，作為她的書的序言。

我對《紅樓夢》一直懷有濃厚的興趣。從進大學開始我就多次地閱讀它。現在差不多每年也還要閱讀一遍。1963 年，我在北師大擔任助教職務時，正當《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逝世 200 週年，我撰寫的處女作《高鶚續〈紅樓夢〉的功過》發表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的紀念曹雪芹的專輯上，從此我的學術研究開始起步。雖然後來因各種原因，不再研究《紅樓夢》，但是對《紅樓夢》的興趣從未消滅。當冉利華決定以《紅樓夢》的經典化為題作為她的博士學位論文寫作時，我很是高興，覺得似乎找到了一個知音。

冉利華博士論文答辯順利通過，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她的論文一個突出的優點，就是她的研究有獨特的角度，目標也十分明確。即她要探討的不完全是《紅樓夢》的思想與藝術本身，而是《紅樓夢》經典化的過程，換言之，也可以說近現代以來文學領域一個「學案」。

中國 18 世紀一個「舉家食粥酒常賒」的窮困潦倒的文人，由於在政治風波中，家道中落，無所事事，出於對過去逝去繁華生活的感歎，拿起筆圍繞自己半生親見的幾個女子編織了一個充滿愛戀的故事。用他小說中自己的話來說，「當此日，欲將以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勸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他甚至沒有寫完他的作品，就在窮愁困頓中離世，留下八十回小說，無法印成書，只有一些親朋好友在傳抄。這樣不被看好的書，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書，會成為文學「經典」嗎？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

轟動一時的書，多少年後，會無人問津，成為圖書垃圾；倒是那些默默無聞的當時幾乎無多少人知曉的作品，經過時間的篩選，卻會成為被讀者奉若神明的偉大的經典著作。曹雪芹的《紅樓夢》就是這樣一部當時幾乎無多少人知曉、完全不被看好的殘書，經過一百多年的流傳後，變成了中國文學一大經典。我的學生冉利華要探討的問題，就是《紅樓夢》如何從一部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書變成偉大經典的過程，這樣一個學術研究視角，既獨特，又普通。但冉利華就是要在這個既獨特又普通的視角裏，通過學術話語，深入地完滿地回答這個世上許多人在追問的問題。

冉利華博士論文的另一個突出的優點，就是她選擇的精確。她沒有囉囉嗦嗦把《紅樓夢》的流傳過程全部敘述出來。她選取《紅樓夢》闡釋中四個相關學案來展開她的考證和論述。從曹雪芹 1763 年逝世至今，談論、闡釋《紅樓夢》的傳說、故事、言論和著作很多很多。但是冉利華沒有貪圖全面、完整，而是選取了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即舊紅學的代表）、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即新紅學）、毛澤東發動的評《紅》（即「革命紅學」）和劉心武的「秦學」研究與風波（即後現代紅學）四個重要的點，深入地展現這四個點對於《紅樓夢》的經典化所起的作用。她的這個選擇是明智的。因為這四個點正是「紅學」展開的四個具有標誌性的階段，從古典主義的研究（蔡元培的索隱），到現代主義的研究（胡適的自敘傳理論），再到革命主義研究（毛澤東評《紅》），最後是後現代主義的研究（劉心武的「秦學」的「紅學」）。現在看來，「紅學」的勃興大體上都可以歸入到這四個點或四個階段。

冉利華博士論文的第三個突出的優點就是論文的深厚的學理性。她的研究要是停留在對這四個點的資料的搜集和堆砌上面，那麼就會顯得膚淺。她沒有這樣做。她注重對這四個點的學理的分析 and 評價。就以對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的分析、評價來說，冉利華當然知道蔡元培是用漢代的經學方法來研究《紅樓夢》，其中多是「附會的法子」，其結論不可能說服人。但冉利華的分析、評價中，能比較客觀地給予蔡元培的研究及其效果以肯定的評價。她認為，第一，蔡元培的著作成為「暢銷」書，引起廣大讀者的興趣，爭相閱讀，促進了《紅樓夢》的經典化。她說：「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以及由它所代表的紅學索隱派）之存在雖然長期以來遭到了紅學界幾乎眾口一詞的排斥與反對，但是它問世後很長時間之內銷量卻出奇的好，從 1917 年初版之後又連連再版，到 1930 年已出至第十版，完全稱得上『暢銷』二字。《石

頭記索隱》如此驕人的傳播成績如果說還不能視同大受讀者歡迎認可的話，那麼至少可以說它引起了廣大讀者的興趣與重視，因此也就必然引起廣大讀者閱讀與研究《紅樓夢》本身的興趣。即使撇開蔡元培秉承中國文學中影射研究之作之傳統，在《紅樓夢》研究中把索隱派發揚光大不談，僅僅從引起大家對《紅樓夢》的高度重視這個工作而言，說蔡元培及其《石頭記索隱》對《紅樓夢》之經典化功不可沒也應該是恰如其分的。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對於《紅樓夢》經典化的意義並不在於其所用的方法或其索解出來的結論，而在於蔡元培作為一個學貫中西、在中國新文化建設上頗多卓越見解與非凡建樹的通學大儒，對於一部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話小說進行認真的研究並且為之專門著述這一行動本身的含義與影響。」第二，她認為蔡元培的著作的影響，促進了白話文的推廣。她說：「蔡元培寫作《石頭記索隱》的深層動機在於提高語體小說在文學大家庭中的地位，通過肯定語體小說而肯定語體文並促進統一的國語的形成、使用與推廣。」第三，她認為蔡元培的《紅樓夢索隱》一書對於《紅樓夢》的文學價值有著充分的認識和高度的評價。她在引了蔡元培的相關論述之後，概括出蔡對《紅樓夢》文學價值的四點評價：「一、《石頭記》是許多語體小說裏面最好的一部；二、《石頭記》在思想上、藝術上都有著了不得的價值。（按：在這一點上冉利華引了蔡元培著作中的分析：他反對父母強制婚姻，主張自由結婚；他那表面上反對肉欲，提倡真摯的愛情，又用悲劇的哲學思想來打破愛情的纏縛；他反對祿蠹，提倡純粹美感的文學。他反對歷代陽尊陰卑、男尊女卑的習慣，說男污女潔，且說女子嫁了男人，沾染男人習氣，就壞了。他反對主奴的分別，貴公子與奴婢平等相待。他反對富貴人家的生活，提倡莊稼人的生活。他反對厚貌深情，贊成天真爛漫。他描寫鬼怪，都從迷信的心理上描寫，自己卻立在迷信的外面。）三、《石頭記》表面香草美人的文字之下，還寄託著前清種種傷心慘目的事實；四、即使放在世界文學之中，《紅樓夢》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只有歌德的《浮士德》可與之媲美。」對於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如何「走錯了路」，是容易說清楚的，甚至是一目了然的，但要客觀地評析《石頭記索隱》中種種值得肯定的部分，卻不是容易的，但冉利華做到了，這是值得欽佩的地方。

冉利華博士論文的第四個突出優點是能從現代經典理論切入，不厭其繁地搜集事實和資料，揭示《紅樓夢》經典化的外部原因。特別是對商業資本

與文化的關係，有很好的理解。她用了整個「下編」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從下面這兩章的題目，就可以見出其中的新見：「名人效應與文化資本戰爭」、「《紅樓夢》在中國社會的高度普及」。立論是高的，資料的搜集和整理是翔實豐富的，梳理是清晰的。要是冉利華不能全身心投入，不能狠下工夫和力氣，不能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那麼她的博士論文寫作是不能獲得成功的。

獨特的視角，精準的選擇，學理性的研究，經典化理論的尋求，構成了冉利華博士論文的突出特色。冉利華還年輕，她只要自己下定決心，一定會在學術研究上走得更遠，獲得更多更好的成果。我深深地祝願她！

童慶炳 2012-12-12



目

次

序	童慶炳	
緒論		1
一、選題的價值和意義		1
二、基本研究方法		2
三、經典概說		4
四、《紅樓夢》——經典常青樹		5
上編	你方唱罷我登場——《紅樓夢》經典化 過程歷史掃描與定點考察	11
第一章	鮮花著錦 烈火烹油——《紅樓夢》經 典化過程概述	13
第二章	蔡元培：古典紅學研究	21
第一節	傳統的影射研究之範本——《石頭記索 隱》	21
第二節	蔡元培創作《石頭記索隱》的動機	33
第三章	胡適：現代紅學之一種——科學主義研 究	45
第一節	新紅學的開山之作——《〈紅樓夢〉考 證》	45
第二節	胡適考證《紅樓夢》的背景與動機	47

第四章 毛澤東：現代紅學之另一種——意識形態批判	75
第一節 《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之始末	75
第二節 毛澤東發起《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的原因與動機	80
第五章 劉心武：後現代的「平民紅學」	107
第一節 秦學風波	107
第二節 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的動機	132
下 編 《紅樓夢》經典化的外部原因	141
第六章 名人效應與文化資本戰爭	143
第七章 權威媒體推動下的紅學繁榮	155
第八章 《紅樓夢》在中國社會的高度普及	173
第一節 《紅樓夢》走進教科書	174
第二節 《紅樓夢》改編成戲曲	178
第三節 《紅樓夢》走上熒屏	184
第四節 《紅樓夢》以其他多種方式在民間傳播 ..	190
餘 論	195
參考文獻	201
後 記	209

緒 論

一、選題的價值和意義

《紅樓夢》自問世至今一直是中國文學的研究重鎮。一代一代的文人學者運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從各種各樣的角度，圍繞著《紅樓夢》進行了廣泛、深入而細緻的研究：有的逞奇特之想像，極力尋求文本中隱藏的「本事」或「微義」；有的本科學之精神，小心考證歷史上尚無定論的「作者」與「本子」；有的細細品味，剖析小說藝術之精妙卓絕；有的深深思索，發掘作品思想內容之深厚廣闊；有的借助於它領悟到了中國文化之精神，而有的還從中總結出了處世之法、管理之道、養生之術……馮其庸老先生豪邁地預言：「大哉《紅樓夢》，再評一千年！」20世紀對《紅樓夢》的種種研究已經使紅學成了一門專門的學問，成了與甲骨學、敦煌學兩大門東方專學鼎足而立的三大顯學之一，而回顧紅學發展過程、梳理紅學研究歷史的著述也在陸續出現。但很少有人從歷時的角度思考《紅樓夢》的經典化問題：《紅樓夢》的經典地位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在漫長的閱讀史中被逐漸建構起來的。那麼它是如何被建構成這樣一部經典的？除了它自身具有的某些經典性特質以外，在它邁向永恒經典的寶座、鞏固經典地位的過程中，還有哪些外在的因素起了作用？考察《紅樓夢》經典化的問題，需要用比通常的文學研究更寬廣的視角、更開放的眼光，其結果將使得我們對於《紅樓夢》巨大的思想藝術容量與歷久彌新的闡釋魅力有更辯證而全面的認識，對於中華民族的文學規範與文學傳統有更清醒的把握，同時也為本民族審美理想與社會文化的勘測提供一條線索。

二、基本研究方法

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

法國社會學大師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學術思想極其複雜，而文化資本理論是其社會學思想的重要內容。

布爾迪厄的資本概念不同於經濟學家所用的資本概念。在他看來，資本是積累起來的勞動（以物化的形式或「具體化的」、「肉身化的」形式），這種勞動可以作為社會資源在排他的基礎上被行動者或群體所佔有。

布爾迪厄把資本的概念擴展到所有的權力形式。他認為，當一種資源因其具有很高的價值而成為爭奪對象，並發揮「社會權力關係」的功能時，這種資源就可以理解為資本。因此他不僅在經濟領域發現了資本，更在社會、文化領域發現資本這種權力形式的存在。

布爾迪厄認為，資本可以表現為三種基本的形態：（1）經濟資本，這種資本可以當下直接轉換成金錢，它是以財產權的形式被制度化的；（2）文化資本，這種資本在某些條件下能轉換成經濟資本，它是以教育資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3）社會資本，它是以社會義務（「聯繫」）組成的，這種資本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轉換成經濟資本，它是以某種高貴頭銜的形式被制度化的。（註1）

儘管文化資本的概念並不是布爾迪厄首創的，但是布爾迪厄將這個概念帶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他對於文化資本的一系列探討引起了深遠的影響。

在布爾迪厄看來，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可以以三種形式存在：（1）具體的狀態，以精神和身體的持久「性情」的形式；（2）客觀的狀態，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圖片、書籍、詞典、工具、機器，等等），這些商品是理論留下的痕迹或理論的具體顯現，或是對這些理論、問題的批判，等等；（3）體制的狀態，以一種客觀化的形式，這一形式必須被區別對待（就像我們在教育資格中觀察到的那樣）。（註2）

布爾迪厄將場域（field）作為他進行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單位，他以資本（capital）為工具將對場域的分析擴大到整個社會。

〔註1〕 包亞明：《布爾迪厄訪談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2頁。

〔註2〕 包亞明：《布爾迪厄訪談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2～193頁。

「場域」是布爾迪厄社會學中的一個關鍵的空間隱喻。布爾迪厄說：「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係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架。正是在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們強加於佔據特定位置的行動者或機構之上的決定性因素之中，這些位置得到了客觀的界定，其根據是這些位置在不同類型的權力（或資本）——佔有這些權力就意味著把持了在這一場域中利害攸關的專門利潤的得益權——的分配結構中實際的和潛在的處境，以及它們與其他位置之間的客觀關係（支配關係、屈從關係、結構上的同源關係，等等）。」（註3）通俗點兒說，場域可以被視為一個圍繞特定的資本類型而組織的結構化空間。行動者為了積累、爭奪、壟斷不同類型的資本而在這個結構化空間中展開鬥爭。比如，在文學場或藝術場，最主要的爭奪對象就是文化資本，而在經濟場，爭奪的主要對象則是經濟資本。

場域內存在力量和競爭，而決定競爭的邏輯就是資本的邏輯，「一種資本總是在既定的具體場域中靈驗有效，既是鬥爭的武器，又是鬥爭的關鍵」（註4）。場域中的遊戲就是以資本爭奪資本的過程。

布爾迪厄強調指出，儘管場域是一種客觀的關係系統，但是場域中的行動者（agent）並非被外力機械地推來扯去的「粒子」。相反，他們具有一種使他們積極踴躍地行事的傾向（註5），一種屬於自己的性情傾向系統——習性（habitus）。按照布爾迪厄的解釋，習性是「持久的、可變換的一些性情系統，是一些被建構的結構，這些結構傾向於作為建構型結構而起作用，也就是作為這樣一些原則而起作用：它們產生和組織了實踐和表徵，從而，即便並未有意識瞄準一些目標，或者並未明確掌握為達至這些目標必具的運作程序，就可以客觀地適應其結果中去。」（註6）

本書將嘗試運用布爾迪厄文化理論的主要概念工具「文化資本」、「場域」、「習性」等對《紅樓夢》經典化過程中諸因素與現象進行一定的描述與分析，以揭示《紅樓夢》經典化現象背後的一些不易為人察覺的動因。

〔註3〕〔法〕皮埃爾·布爾迪厄、〔美〕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133～134頁。

〔註4〕〔法〕皮埃爾·布爾迪厄、〔美〕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135頁。

〔註5〕〔法〕皮埃爾·布爾迪厄、〔美〕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148～149頁。

〔註6〕Bourdieu P,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0: 53.

三、經典概說

在漢語中，「經」的本意是織物的縱線，與「緯」相對。許慎《說文解字》說：「經，織從絲也。」段玉裁注解謂：「織之從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後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常經。」正如織布要有經和緯（縱線和橫線）起規範作用一樣，人生在世，也必須有「三綱五常六藝」等作為為人處世的規範與準則。如此一來，在中國古代「經」就被引申為被尊崇為典範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甚至專指典範的儒家著作了。「典」的本意為常道、法則。

《爾雅·釋詁》說：「典，常也。」《爾雅·釋言》則說：「典，經也。」從這兩層意思出發，典即引申為記載常道與法則、可以作為典範的重要書籍。《尚書·夏書·五子之歌》中即有「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句。孔安國《傳》曰：「典，謂經籍。」孔穎達疏曰：「『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為經籍。」可以說，在漢語中，「經」、「典」本為一義；二者合而言之，更其強調，指那種長期流傳下來的具有典範性和權威性的作品，正如劉勰所謂「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至道」指的就是經典的權威性與規範性，而「恒久」與「不刊」則說明其流傳之久遠，不容置疑。在英語中，與漢語「經典」相對應的主要是 canon 一詞。canon 在英文中具有兩層基本含義，一層含義是「教規」，即由教會確定的法律或法典，另一層含義是「標準」，即判斷的依據或原則，與中文「經典」具有非常相似的意思。概而言之，無論中文「經典」還是英文 canon，都同時具有「規範」和「恒久」兩層含義。

雖然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經典化問題成為西方文學研究者關注的焦點以來，傳統文學經典受到了越來越強烈的挑戰，女性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後殖民主義和新歷史主義等各種觀點的學者就經典是否有統一的標準、如何鑒別經典、誰的經典、什麼樣的經典等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拓寬經典」的呼聲越來越高，文學經典越來越難以界定，但我們要探討《紅樓夢》經典化問題，卻不得不勉為其難，首先對「什麼是文學經典」這一個問題給出簡明的回答。我們所謂的文學經典，指的是長期流傳下來的具有典範性和權威性的文學作品。關於「長期」，我們以約翰遜博士（S. Johnson）認同的標準為參考。約翰遜在《〈莎士比亞戲劇集〉序言》裏說，「（莎士比亞）他早已活過了他的世紀——這是為了衡量文學價值通常所定的時間期限。」〔註 7〕

〔註 7〕〔英〕約翰遜：《〈莎士比亞戲劇集〉序言》，《莎士比亞評論彙編》，楊周翰主

按照他的說法，一部作品或一個作家能否真正成為經典需要經歷一個世紀的時間考驗。這種主張也許有點苛刻，卻也不無道理。黑茲利特說得好：「我認為一本書在作者死了一兩代人後仍能生存並非壞事。我對死者比對生者更有信心。當代作家一般可分為兩類：朋友或敵人。對朋友我們難免想得過好，對敵人我們總是想得太壞，這樣我們就不能從細讀中得到很多快樂，也無法公正地評價他們各自的優點。」〔註8〕因此真正的文學經典是經過了「一個世紀」的考驗，或者說在作者死了一兩代人之後仍能讓很多與作者毫無生活情感聯繫的讀者「從細讀中得到很多快樂」的作品。關於「典範性和權威性」，我們以佛克馬和蟻布思在《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一書中所提供的兩種對於文學經典的理解作為標準。第一種是最普遍的理解，認為經典是「精選出來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價值，用於教育，而且起到了為文學批評提供參照系的作用」〔註9〕，也就是說文學經典是這樣一些作品，它們享有很高的聲譽，被認為是同類作品中出類拔萃的頂尖之作，是文學批評的標準，是作家模仿的對象，並長期被納入學校教育體制之中，被指定為學校讀物，通過課程教學得到傳承。第二種是羅森格倫所提出的觀點，認為「經典包括那些在討論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學批評中經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註10〕，也就是說經典作品應該是這樣一些作品，它們經常受到主流文化圈的關注，為學者、評論家、作家所研究、評論與稱引，是頻頻被指涉的對象，並因此而得到普及與流傳。

四、《紅樓夢》——經典常青樹

若以上述關於經典的涵義與特徵的簡要描述作為標準來衡量《紅樓夢》，恐怕誰都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紅樓夢》是中國文學中一部當之無愧的經典，因為它符合經典的所有標準：

兩個多世紀以來，它在中國一直享有崇高的聲譽。清末傑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詩界革命巨子」黃遵憲曾向日本學者介紹它「是開天闢地、

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38頁。

〔註8〕轉引自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江寧康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年，第415頁。

〔註9〕〔荷〕佛克馬、蟻布思：《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俞國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50頁。

〔註10〕〔荷〕佛克馬、蟻布思：《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俞國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51頁。

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註11〕；清末民初中國文壇上影響最大的人物，集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啓蒙思想家、資產階級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等多種身份於一身的梁啓超曾聲稱「清之……文學……以言夫小說，《紅樓夢》只立千古，餘皆無足齒數」〔註12〕；清末民初著名國學大師、「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王國維曾斷言《紅樓夢》「自足爲我國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註13〕；清末民初著名古文家、「中國近代文壇的開山祖師及譯界泰斗」林紓也承認「中國說部，登峰造極者無若《石頭記》」〔註14〕，「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爲教科之書」〔註15〕；清廷翰林編修、民國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認爲「許多語體小說裏面，要算《石頭記》是第一部……他在文學上的價值，是沒有別的書比得上他」〔註16〕；著名作家、文學史家、「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藝運動的旗手」魯迅評價「《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的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和寫法都打破了」〔註17〕；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主席稱讚《紅樓夢》是「中國古代小說寫的……最好的一部」〔註18〕……在1947~1949年初版的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它「不單是十八世紀中國偉大的文學傑作……《紅樓夢》在文學史上的價值，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世界的」〔註19〕；在1962年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何其芳爲文學所第一任所長）編的《中國

〔註11〕《黃遵憲全集》（上），陳錚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648頁。

〔註12〕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啓超卷》，劉夢溪、夏曉虹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08~209頁。

〔註13〕《王國維文集》（上），姚淦銘、王燕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15頁。

〔註14〕林紓：《孝女耐兒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07年。

〔註15〕林紓：《林琴南致蔡元培函》，《蔡元培語言及文學論著》，高平叔編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8頁。

〔註16〕《蔡元培語言及文學論著》，高平叔編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7~188頁。

〔註17〕魯迅：《清小說之四派及其末流》，《中國小說史略》（附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

〔註18〕董志文、魏國英：《毛澤東的文藝美學活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04頁。

〔註19〕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47頁。該書在初版後的五十多年的時間裏多次再版重印，一直作爲大學中文系專業教材。